

外文图书采选工作

李伟 朱硕峰 顾犇 著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文图书采选工作 / 李伟, 朱硕峰, 顾犇编.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1.1

ISBN 7-80142-238-4

I. 外... II. 李... III. 外文-图书采购 IV. G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1943 号

外文图书采选工作

李伟, 朱硕峰, 顾犇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5286554)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7.25 印张 172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42-238-4 / Z · 102

定价: 26.00 元

前言

图书采选工作是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工作，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图书馆的馆藏质量，影响其对读者的有效服务。

多年来，图书采选工作基本上是经验性的，由师徒口授的形式代代相传，较少书面的理论总结。在图书馆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图书馆人员流动频繁，图书馆员的岗位培训日益重要，师徒相传的形式不能满足业务工作规范化的要求。

为了培养新一代的高素质图书采选工作人员，国家图书馆近年来实施“123 工程”，采用“师带徒”的方式，由老一辈图书馆员向年轻图书馆员传授业务知识和技能。为此，国家图书馆前副馆长、研究馆员邵文杰老师准备了一年两个学期的讲义，系统地讲解了外文图书采选工作的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李伟、朱硕峰和顾犇整理成文。在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编目部和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图书部的支持下，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参考了许多有关的著作和期刊文章，并利用了国家图书馆历代外文图书采选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包括许多未发表过的内部文字资料。所以说，本书虽然是以若干著者的名义撰写的，但它是众人智慧的结晶，也是外文图书采选工作的经验总结。邵文杰老师设计了本书的框架结构，李伟负责撰写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第十章和第五章的前两节，朱硕峰负责撰写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七章、第九章和第五章的第三节，顾犇负责撰写第十一章。最后，邵文杰老师两次审核了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顾犇进行了统稿工作。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没有能够对书稿作更细致的修改。出版业的变化日新月异，书中的有些内容也许不能反映最新的情况。在此，敬请读者随时向作者提出不足

之处，以便今后有机会时修改。

我们想感谢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图书部对本书策划和出版的支持和帮助。此外，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编目部的景鸿达主任和图新书店的杜红卫先生也在本书的撰写和出版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表示感谢。

著者

2001年1月

序

1999-2000 年间，在国家图书馆人才发展“123 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为图书采选编目部从事外文图书采选工作的人员开设讲习班，采用讲课与研习的方式，从知识(knowledge)、信息(Information)和操作(practice)三个方面系统地讲授外文图书采选工作，历时一年。讲习班结束后，大家认为有所收获，希望能将课程内容整理成书，留在手头以供工作中随时参考、借鉴。考虑到讲习班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如编印出版面对广大读者，其内容应进一步扩展与补充。写书任务落在顾犇、李伟、朱硕峰身上。他们三位从事外文图书采选工作多年，业务上颇有建树，这次动笔除参考中外许多有关文献还总结和引用了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几十年来（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在外文图书采选工作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实弥足珍贵。

愿以此书推荐给图书馆界、书业界的同仁和关心我国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社会人士。

邵文杰

2001 年 1 月

前言

图书采选工作是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工作，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图书馆的馆藏质量，影响其对读者的有效服务。

多年来，图书采选工作基本上是经验性的，由师徒口授的形式代代相传，较少书面的理论总结。在图书馆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图书馆人员流动频繁，图书馆员的岗位培训日益重要，师徒相传的形式不能满足业务工作规范化的要求。

为了培养新一代的高素质图书采选工作人员，国家图书馆近年来实施“123 工程”，采用“师带徒”的方式，由老一辈图书馆员向年轻图书馆员传授业务知识和技能。为此，国家图书馆前副馆长、研究馆员邵文杰老师准备了一年两个学期的讲义，系统地讲解了外文图书采选工作的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李伟、朱硕峰和顾犇整理成文。在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编目部和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图书部的支持下，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参考了许多有关的著作和期刊文章，并利用了国家图书馆历代外文图书采选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包括许多未发表过的内部文字资料。所以说，本书虽然是以若干著者的名义撰写的，但它是众人智慧的结晶，也是外文图书采选工作的经验总结。邵文杰老师设计了本书的框架结构，李伟负责撰写第三章、第六章、第八章、第十章和第五章的前两节，朱硕峰负责撰写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七章、第九章和第五章的第三节，顾犇负责撰写第十一章。最后，邵文杰老师两次审核了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顾犇进行了统稿工作。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没有能够对书稿作更细致的修改。出版业的变化日新月异，书中的有些内容也许不能反映最新的情况。在此，敬请读者随时向作者提出不足

之处，以便今后有机会时修改。

我们想感谢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图书部对本书策划和出版的支持和帮助。此外，国家图书馆图书采选编目部的景鸿达主任和图新书店的杜红卫先生也在本书的撰写和出版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表示感谢。

著者

2001年1月

第一章：外文图书采选工作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古代

我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了不计其数的图书典籍。历朝的统治者在确立统治地位以后，都要建立藏书之所，收罗天下图书。

从现有的史料看，中国的图书馆史可上溯到殷商时期。考古发现，在河南安阳发掘出土的殷墟，有大量甲骨集中存放在窖穴中，这些窖穴的位置大部分在王室的宗庙宫室内或附近。因此推断这些窖穴是殷王室储存文献的地方，被视为最早的图书馆。从殷商开始，已经有了专门管书的人员^①。周朝有专掌图书的史官；相传，道家的老子就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因而被称为“第一任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所职掌的周王室藏书室，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官方藏书机构。除了官方藏书外，战国时期，随着“士”阶层的形成，产生了私人藏书。有人断言，我国古代的藏书，远在华夏文明初始的年代即已发端，并伴随了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之始终。^②因而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相当发达。

古代的图书馆通常只起到收藏、保护文献的作用，利用范围很有限。所藏书籍也基本上是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等官方认可的文献，没有有计划、有目的地收藏过外文资料。在敦煌石窟中发现有唐代景教经文抄本多部。这种宗教典籍可能是最早的外文资料。明代中叶著名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以及其后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

^① 王西梅.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2.

^② 吴晞.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人在中国外来文献收藏史上有重要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著名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金尼阁在明万历年间两次来华传教。1614年他返回欧洲后,向各方募集图书,共得到西文书籍七千余部。这些数量庞大、门类齐全的西方图书进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并由此创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颇具规模的基督教教廷图书馆。在明末清初之际,在北京形成了著名的“四堂”图书馆。但是,这些由传教士们经营的教廷图书馆、“四堂”图书馆等,除了藏有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也读不懂的洋文书外,与中国的传统藏书楼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节: 近代

以近代西方图书馆为模式的图书馆在我国出现始于鸦片战争后。最早出现的是外国人在华开办的教会图书馆。比较有名的是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楼,创办于1847年。此馆主要收藏外文的宗教书籍,供与教会有关的人员阅读。上海工部局图书馆建于1849年,1851年起称上海图书馆,是外国人以租借地中国人的税款为主要经费办起来的,但教会在其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图书馆多任主管都是西方传教士。所藏80%为外文书,故又称“洋文书院”或“洋文图书馆”。

国人对图书馆的重视在西学东渐盛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较突出。改良派人士把图书馆作为“教育救国”的工具。1892年,郑观应在他的《藏书》一文中,提到欧美各国藏书事业发达,而我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藏书却仅数处,应该在各厅、州、县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③建立新式图书馆也是维新人士主张的

^③ 同①。

的改革措施之一。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把成立图书馆作为开智教民的方法。梁启超和汪康年在《时务报》上称“书籍馆”为兴国的三大“盛举”之一。在维新派人士的宣传中，提出不仅要遍设图书馆，而且提出购买国外图书，供国人阅读。而且康梁等维新派人士身体力行，建立了各种学会藏书室。上海强学会在章程中规定建立图书馆的目的是“聚天下图书器物，集天下心思耳目；略仿古者学校之规，及各家专门之法，以广见闻而开风气……”。从 1895 年到 1897 年，国内已设立学会 24 所，学堂 19 所，和报馆 8 所，还有很多译书的机构，这些组织大多附设了对本单位或兼对外开放的藏书机构。虽然维新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却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他们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各种藏书机构，已经不同于古代的藏书楼了。这些藏书室在馆藏建设上都是古今中西并重，书报兼备，而且注意馆舍和选址，科学管理。以京师大学堂的藏书为例，当时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在各学堂中最大。《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在开办经费方面，购书列有专项。规定：购东方书费约 1 万两，购西文书费约 4 万两，购中国图书费 5 万两。这是我国最早规定专用购书经费的章程。

戊戌政变后，在维新时潮的影响下，安徽、浙江等省出现了公共藏书楼。最有名的是古越藏书楼，在浙江绍兴市，由私人藏书家徐树兰创办，1904 年开馆。这是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河，其办馆思想为“存古”、“开新”，章程规定“凡已译未译东西书籍一律收藏”，该馆已藏有外文原版书。

1904 年，湖南省图书馆建立，这是我国第一家官办公共图书馆。到辛亥革命前，各省纷纷创办了官办公共图书馆，约有 20 多座。它们在馆藏建设上都是古今中西并重。当时原版外文书较少，西学主要是译本。但由此可见，收集外文图书资料从一开始就是近代图书馆的任务之一。

在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产生了划时代作用和最有影响的事件，当推京师图书馆的创建。与各省相比，京师图书馆的建立相对较晚，而且颇费周折。在首都设立国家图书馆的构想由来已久，郑观应、梁启超等人都倡导过建立全国性的图书馆。1906 年，罗振玉写了《京师创立图书馆私议》，对比西方诸国，提出“先规画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并提出了择地建筑、请赐书、开民间献书之路、征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置写官、采访外国图书等六项措施。1909 年学部上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提出宣统元年“京师开办图书馆”和“颁布图书馆章程”的计划。要求将热河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内阁大库旧藏及《永乐大典》残本移交图书馆，并奏定德胜门内净业湖及南北一带为馆址。但由于清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后又是连年的军阀混战，新馆舍始终没有建起来。暂借什刹海北岸广化寺为馆址。1912 年正式开馆。京师图书馆最初的馆藏以清、北洋政府的调拨、征集和外省选送为主。筹建时也算设立专藏外文书的场所，但所藏图书主要是中文古籍。1917 年 1 月京师图书馆正式举行开馆仪式时，藏书共有 5424 部，151375 卷，52326 册。其中善本书 880 部 28412 卷，10822 册。

到 1929 年，京师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前，共有藏书 148000 册，其中西文书 672 册，东文书 178 册，不少是在华外籍人士或国外赠书。可见外文书很少。

1925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利用美国庚子赔款余额，独自在北海建立了北京图书馆，北伐后，先后更名为北平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鉴于京师图书馆以中文古籍为主，为避免重复，北京图书馆藏书侧重于东西文的国外出版物。到 1929 年与京师图书馆合并前，共藏有西文图书 21050 册，日文书 746 册，交换的官书（即政府出版物小册子）53082 册。当时外文馆藏最丰富就是北海图书馆，这是今天国家图书馆外文藏书的奠基石。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重新达成协议，

京师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并后，图书馆的人力、物力、实力大增。1931-1937 年间这个阶段，是该馆外文藏书建设的黄金时期，外文文献的采访工作在这个时期逐渐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购书经费

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拨付的经常费中购书经费单列，其中购买西文资料的部分占十分之八，且拨付美金，可以直接向国外订购书刊。这个时期的年均购书费约 30000 美元。年购西文书 6000 册、日文书 1000 册，再加上捐赠、交换途径所得，年进西文书近万册，日文书 1,500 册左右。

2、购书委员会。

主持馆务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分设了购书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决定购书方针和计划；审核图书馆拟定的每年分组分类购书费概算；介绍审核图书等。委员属名誉职，但凡关于采访的重要事务均提交委员会讨论做出决定。委员会分设西文、中文两组，小组设书记，由馆中、西文采访负责人兼任。

3、购书政策

购书委员会制定的购书政策：一是为国家搜罗重籍，二是为研究提供便利。对中国旧籍应就原有基础广泛搜罗，做到无所不备。对于西文书则着重供给科学研究之方便。即“中文书求全，外文书求精”，这成为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后来一直遵循的藏书建设基本方针。

4、藏书特点

由于购书经费有限，为避免重复，对北平地区各个图书馆的藏书进行了调查，了解到协和医学校收集医药学书较全，地质调查

所收集地质、地文书齐全，决定不复收藏。政治学会收藏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书完备，但该会限于性质及经费只能采购最重要的一部分，故社会科学书仍须积极购买。基于调查情况，购书委员会决定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中国学和参考工具书为采访重点，逐步形成本馆的藏书特点。工程技术方面的书最初未引起注意，收藏较少。1934 年在中美工程师学会的呼吁下决定建立工程参考室。

5、购书途径

1931 年图书馆成立大同书店，图书馆无需通过中介机构可以由大同书店直接从国外购买，享受一定的折扣。购书委员会西文组书记也是西文采访组负责人顾子刚兼任书店经理。顾子刚和英国书商布莱克维尔公司(B.H. Blackwell's Ltd.)建立了业务往来。

但由于日本加紧侵华战争的步伐，华北政局吃紧，北图馆藏珍本开始南迁。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部分员工迁往内地，先后在长沙、重庆、昆明、上海、香港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大部分人员继续留在北平，维持对外开馆。抗战初期，庚子赔款照付，由昆明办事处通过香港采购，辗转运往内地。因经费分散，加上物价飞涨，只能维持一些主要的学术期刊的购买。1941 年，中美新约生效，庚款停付。基金会的收入来源已尽，西文购书费降至年仅数千美元，有时还以国币支付，要到黑市兑换外币，外文购书受到严重挫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对外渠道中断，外文资料采购陷于停顿。国立北平图书馆多次呈文重庆国民政府，以“国立”身份请求将本馆经常费用列入国家正式预算，从 1940 年教育部以补助费形式拨发，虽历年有所增加，但为数甚少。为了用好有限的资金，1943 年重组购书委员会，聘请在美的中国学者担任委员，委托他们在美购置数学、物理、生物、工程、东方学以及政治、经济图书。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了伪国立北平图书馆，昆明办事处的人回北平，重新恢复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称呼。此

后，与基金会完全脱离关系，经费全部由南京政府教育部拨付。但教育部核定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年度经费预算内仅有薪给和经常办公费用，无购书费专项。每购一书均须在临时费项目内开支，临时请拨，公文往来，还须时日，也没有外汇，购书困难重重。在 1945 和 1946 年间接收敌伪汉奸的数万册日文书，大大补充了日文馆藏。此外无多大建树。

接着内战爆发，工作再次陷于停顿。1948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所做的统计数字（包括接管、寄存书），共有藏书 140 万册，其中西文书 16 万册多，日文 5.6 万册，未加工的西文书 2 万册，日文约 9 万册。

由于新式图书馆及其外文藏书一开始就和救国救民联系在一起，所以得到很多学界泰斗、文化名人的重视。很多知名人士参与了近代图书馆事业，梁启超、马叙伦、陈垣、蔡元培等曾出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在当时北图的购书委员会成员中，有陈垣、付斯年、陈寅恪、胡先骕、叶企孙等人，西文组主席为张子高，书记为顾子刚。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以后

新中国成立后，图书馆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气象。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仅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就达到 1000 多个，高校图书馆 200 多个。工会图书馆则达 3 万多个。此外，还有军队、机关、中小学等各类图书馆。

建国初期，我国处于国民经济恢复建设时期，急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对外文信息资源的采访比较重视。但由于冷战的影响，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贸易禁运。西文图书进口受到严重制约，主要是通过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交换来进行。因此，交换就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渠道。这个时期俄文书刊的数量激增。以

1952 年北京图书馆的外文进书为例，当年共收外文书 10751 册，其中来自苏联的俄文书就有 8160 册。随着图书进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从 1956 年国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到 1958 年大跃进，是解放后购买外文资料的第一次飞涨。再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为例，1959 年当年共收进外文书 65213 册，其中西文书 24851 册，俄文书 30238 册，东文书 10124 册。而且，解放后，北图为了适应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需要，补充了不少科技类的图书。但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购书量又急剧下降，到 1962 年跌到谷底。在经济调整后，1963 年开始恢复，直到文革爆发。

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受到破坏，把外文书刊斥为“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许多图书馆的外文书刊都停止了采购，破坏了许多刊物的连续性，造成藏书体系的残缺不全，在外文图书采选上造成很大混乱。如北京图书馆，1967 年实行军事管制，闭馆参加运动，外文采访陷于停顿。1969 年的外文图书采访与 1965 年相比，西文减少了 70%，俄文减少了 87%，日文减少了 80%，外文期刊减少了 50%。在 1971 年重新开馆恢复业务时，受极左思潮影响，在外文图书采购方面片面强调只要革命的、进步的，大量停购外文书刊，引起许多使用单位的不满。为此，国务院 1973 年 5 月行文提出批评。

文革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步伐，图书馆事业也逐渐走上正轨，并进入飞速发展时期。外文图书的采访工作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的需求重新走上正轨并得到迅速发展。

下面以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为例，对解放后的外文图书采访状况概括一下。

1、购书经费

解放后，购书费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年度预算中作为专款，不得挪作它用。这是藏书建设的基本保证。20 世纪 80

年代后购书费逐年增加，到 1999 年全馆经费已近人民币亿元，其中购书经费占 70%，而用于外文书刊的费用又占 80% 以上。当然，由于外文书刊价格的上涨和外汇汇率的上扬，外文出版物的年购入量并未和购书费的递增同步增加，但基本保持了稳定的态势。购买国外出版物所用的外汇，80 年代以前由国际书店和后来的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掌握，统一分配使用。1982 年北京图书馆获准外汇专款，用来直接从国外购置书刊资料，每年 20 到 60 万美元，扩大了外国出版物的采选渠道，购进了一批通过商业途径难以购入的文献资料，而且节约了购书费用。

2、采选渠道

1981 年以前国外出版物的进口由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独家经营，虽有利于国家用于购买外国出版物外汇的统一调配使用，但受制于一家公司的服务，无法选择。1981 年以后，这一局面被打破，数家公司经营图书进出口业务，可择优选择。而且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可以用自备外汇直接向国外出版社发出订单，也可通过书商订购。前者可获得较多的折扣，后者能提供优质的服务，书价一般低于目录价。

3、采选方式

国际交换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曾是北京图书馆引进外国出版物的重要手段，通过交换入藏的书刊一度曾占全部入藏量的 40%。进入 80 年代以来，国内图书馆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商业途径获得国外出版物；我国的出版物在国外已经容易买到，再加上语言障碍，可用于交换的中国出版物有限，而国外由于经费紧张，所提供的交换物往往是多余的复本或淘汰的旧书，选择余地不大，因此国际交换的比重逐渐下降。现在购买方式已成为入藏国外文献的主要方式，但对收集那些通过商业出版社难以购到的文献仍有特殊意

义。文革后，北京图书馆接受了几批数量比较多的赠书，对完善和补充馆藏起了重要的作用。

4、采选方针

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北京图书馆基本执行“中文求全，外文求精”这一方针。50 和 60 年代除 1961 年制订的《北京图书馆入藏书刊数量标准》规定“进口西文原版书、期刊一般只购一部”的原则外，没有形成成文的采选政策。而这一时期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强调为中心任务服务，从向科学进军、大炼钢铁、大办农业到反帝反修，支援亚非拉革命斗争，采选重点屡次随机变动。1977 年 5 月召开了北京图书馆采访工作座谈会和预备会，会后制订了《北京图书馆外文书刊资料入藏数量暂行规定》和《北京图书馆外文书刊资料采访工作试行条例》。1984 年底召开了北京图书馆采访工作会议，根据国家图书馆的任务与职能，清理了“左”的思想影响，明确北京图书馆的采访方针，制定了《北京图书馆书刊资料采访条例》。在外文书刊采访方面，条例规定了全面采集、着重采选、适当采选和不宜采选四个级别。1996 年又召开采选工作会议，根据新的变化了情况制定了新的《北京图书馆书刊文献采选条例》，1997 年开始全面执行。新条例对各类出版物的采选方式和采选范围做了界定，适应文献载体迅速发展的形势补充了原条例中没有列入的缩微资料、音像资料和电子出版物。

5、采选机构

1981 年为了加强藏书建设特别是外文书刊的采选工作，仿效 30 年代的做法设置了北京图书馆书刊资料采选委员会，聘请来自馆外的学术、教育与工程技术界的委员 8 人，各部门负责采访工作的馆内委员若干名。采选委员会参加采访方针的制定、年度采访计划、年度购书经费的预算的提出与分配以及其它重大采访项目的研究，